

新制度金融学的理论框架与解释力

——兼评张杰教授论文《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赵磊

一、背景：西方经济理论史的简要回顾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前古典、古典、新古典和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¹，一直都在试图寻求着解释与指导人类经济生活的奥义。古典经济学时代是个思想大师辈出的时代，一些原创性的思想至今在影响着我们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甚至成为我们经济学理论继续突破的原点。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同样涌现出了许多大师，他们通过开创规范的分析范式、引入精密的分析方法，构建了我们现在所见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框架，而马歇尔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更是被视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形成与创立的标志。自那以后经济学所披的“学术外衣”也日益繁复精巧，尤其是数理手段作为分析工具的引入，更是大大抬高了经济学学科的入门门槛，也使得经济学陡增了一层愈发神秘诱人的面纱。

而谈当代经济学，则不得不提凯恩斯主义的诞生，这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是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自此，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一直遵循的配置资源的“无形之手”之外，又多了一支“有形之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被大大拓展。而此后，各个经济学流派互相争论的落脚点也大都集中在了“两手”之争。政府与市场之关系也成为了一个极具研究价值且亟待理论突破的新领域。

此外，“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自诞生之后，经济学家们纷纷将注意力放在了寻求并求证可以高效配置稀缺资源的机制之上，着重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说就是人类如何更好的利用大自然来改进人类社会的福利，如何提高生产力。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较少关注，有关“人”的一些分析假定也被高度抽象和简化，人被描述为一个效用函数，更被赋予了“绝顶精明”的品质，人类社会也成为了一个透明和谐的完美社会。而建立在这些假定基础上，所搭建的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则合乎逻辑的论证了市场经济的完美，这在现在任何一本国外的经济学教材中²都已被描述得明白无误，这个宏大的理论体系中所包蕴的紧凑的逻辑，清晰的层次和完整的框架，细细品来，不由得令人深深折服于这种理论之美。

然而无论是多么完美的理论如果失去现实解释力，那也必将大失光彩，新古典理论所基于的过于抽象的假设是这个“完美理论”的硬伤，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恰恰是弥补了这个缺憾。从这层意义上讲，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其

¹ 晏智杰、王志伟、杜丽群：《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²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著名的“三大假设”，修正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前提，同时将注意力更多的倾注在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注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这可以视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归。而且在哲学观上，也更倾向于主动，主张对人类关系进行约束、协调和引导，而不是被动的接受、遵循既有现实。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其更贴近现实的假设、以及新的范式，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变得似乎更为开阔，也具备了更强的解释力与指导力。有的学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在其框架内实现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的整合³，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正是以一个更为宽广的视角在审视着我们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实和未来。

二、根植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制度金融学

最近几十年，新制度经济学无疑是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个亮点。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旧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经过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思、张五常等数代大师苦心经营而建立起来的一方全新经济学研究领域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经济人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为假设前提，以交易成本、产权和制度为理论范畴，兼顾传统经济学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制度分析方法，融合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致力研究个人、集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经济科学。新制度经济学不拘泥于精巧的技术分析，因其宽广的视角和综合的研究方法，对现实经济问题具有独到的解释力。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引进中国，遂很快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与热捧，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尝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的发布，也产生一串令中国学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茅于軾、盛洪、张曙光、樊纲、周其仁、林毅夫、汪丁丁……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经济理论阵营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而最近十几年在我国理论界逐步成型的新制度金融学，本质上是根植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简单说就是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的金融问题，其代表人物有谢平、张杰以及江春等学者。纵观国内的已有文献，新制度金融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大体区分为两层：宏观层面——探讨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评析中国的金融改革战略⁵；微观层面——研究中国的商业银行、农信社等金融组织的产权结构，分析金融组织在既有制度环境中的行为⁶。需要在此强调的一点是，在新制度金融学的理论框架中宏微观两个层面并不是相互割裂的，相反，两个层面是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宏观分析并不是空洞无物的抽象描述，而是以微观分析为基础，以金融组织的经济活动为内涵；而微观分析也不是脱离背景的单纯分析，而是以宏观分析为平台，以金融制度的变迁为制度环境。

³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修订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⁴ 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⁵ 例如：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1998；《制度、渐进转轨与中国金融改革》，2001。

⁶ 例如：张杰：《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2004；《究竟是什么决定一国银行制度的选择——重新解读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含义》，2005；《注资博弈与中国农信社改革》，2006。

三、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新制度金融学反思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好的制度不一定就是有用的制度,中国的制度演进有着特殊的轨迹,尤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上,更是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别,根植于西方历史人文环境而诞生的一系列经济制度,移植到中国,并不一定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关键还要看能否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等相互契合,如果不作考察简单套用,将会抵触中国人的观念,扭曲中国人的心态,不仅不能更好的约束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恐怕还将造成制度的低效和社会的混乱。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针对中国的国有银行制度变迁问题,在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沉浸在对国外商业银行制度的赞美与对国外银行技术的雕琢之中时,张杰教授却通过其论文《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较早的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在这篇文章中,张杰教授指出了似乎已经是理论界共识的谬误之处:

一、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就是通过股份制改造以及引进战略投资者来降低国有成分,进而减少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干预,因为理论界认为国有银行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这种观点事实上是理论界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传统思维在银行改革领域的延伸,是对市场力量的迷信。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政府对于市场的作用,并非总是消极的,就像诺斯悖论所阐述的,没有国家办不了事,有了国家会添麻烦,政府的作用是双向的,我们应该探寻一种可以将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和谐结合的理论 and 现实框架,使两者互相促进,2001 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提出了所谓“强政府、大市场”的“第三条道路”,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换一种思维来对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不能完全肯定政府因素的作用,也不能完全否定其作用。在文中,作者用事实指出,国有银行制度在世界范围的普遍存在性,以及成功运作的范例,此外,对于中国国有银行“低效”的指责,作者也从国有银行在择关系社会长远利益的长期项目选择中的突出作用给予反驳,正是由于政府控制,国有银行的这一项目选择偏好才能得以表现,关于政府控制下的国有银行在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的卓越贡献,张杰教授在其早年的一篇论文⁷中已经借助“金融剩余”这一概念给出了独到而又精辟的分析。

二、国有银行的资本作为防范银行倒闭的屏障,其充足率至关重要,必须满足《新巴塞尔协议》中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规定,鉴于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低资本充足率,政府的注资行为也就具备了急迫性和必要性了。这种观点事实上也是一种没有深入思考中国金融制度环境,简单照搬所谓国际标准的观点。中国既有的国有银行制度是建立在中国特有的非正式制度环境之中的,中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决定了,中国人对政府有着天然的信任感,而中国人保守的性格也使得资产选择偏好安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金融资产将主要以存款形式保有,并且会存放在有政府支持的国有银行之中,同时基本上不会考虑国有银行倒闭的

⁷ 张杰:《中国的货币化进程、金融控制及改革困境》,1997。

可能性⁸。基于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声誉和核心存款两个概念来反驳国有银行低资本充足率的观点。在国有银行中，国家声誉和核心存款是可以视作无形资产而记入核心资本的。所以，中国社会独特的文化与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决定了国有银行独特的资本结构与稳定性，这一点，仅仅用西方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标准是难以剖析的。

可以说，《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一文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与反思，其独到视角与理论价值也为同行所称道。此外，围绕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张杰教授近些年来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与著作，肯定了中国国有银行在改革之初对于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探讨了决定银行制度的因素，论证了国有银行对长期项目投资的特殊保障，提出了政府的“市场参与者”和“市场监管者”双重角色分离的政策建议，形成了一整套逻辑紧凑、体系严密的关于国有银行改革的新制度金融学理论框架。这些观点对于为什么貌似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却可以推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商业化为目标，国际商业银行为模板的国有银行改革为何一再反复，始终难以实现国有银行“变身”夙愿？中国国有银行的未来之路究竟在何方？等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现实问题给出了较好的解答。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制度金融学的学术成果，使我们逐渐找到了打开中国金融问题这把大锁的钥匙，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金融改革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作为制度的最大供给者，所提供的金融制度安排能否有效，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能否和现有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而不是取决于对现有所谓的“先进制度”的了解、引进以及推行决心。因此，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从历史的视角研究中国的非正式制度演进，这两个互相关联但又侧重不同的研究话题，对于当前我国的改革似乎也更具深远意义，也将成为今后新制度金融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⁸ 张杰：《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2003；《究竟是什么决定一国银行制度的选择——重新解读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含义》，2005。